
无锡姚湾无字墓坊略考

——曹端妃并非无锡人氏

王 辉¹

在无锡十八湾的姚湾一带，有一座神秘的冲天牌坊隐于林中。该坊青石所构，四柱三间，描凤画鹤，气魄宏大，观其形格颇有明代王侯神道墓坊的气象。然而奇怪的是，牌坊之上却空空如也，一字未铭，经文保专家勘察，发现并非风化锈蚀所致，也非后人有意凿去，而是自始未刻一字，令人十分费解。自古以来，牌坊一直是旌表功德，规范行止的载体，一般都会通过记载一些简要的文字昭示某种特殊的涵义。《礼记·坊记》有云：“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正因如此，无字牌坊一经发现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这座牌坊究竟是何人所建，用以纪念何人，为何坊上未铭一字，这些谜题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文物专家和文史爱好者的眼球。

据说姚湾当地一直流传着“苏州浒关人，西宫娘娘墓”的民谚，这与硕放曹氏宗族历代流传的族人曹察之女曹端妃葬于西郊的传说不谋而合。加之近年来，在姚湾一带出土了刻有“明曹配华氏孺人墓石”字样的墓志盖，有观点据此提出无字牌坊乃明代嘉靖皇帝后宫端妃曹氏的墓坊，坊后所葬者正是这位在明代中后期引发了一番腥风血雨的曹端妃。

那么曹端妃究竟是否曹察之女，死后是否真的归葬于此，这座无字牌坊是否真是曹察为爱女所修呢？笔者翻阅史料，发现了一些端倪，真相恐怕与流传的“端妃说”观点不同。

首先，曹端妃并非曹察之女，乃是锦衣卫副千户曹济之女。据《明实录·世宗实录》第一百八十一卷记载：“嘉靖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册封锦衣卫副千户曹济女曹氏为端嫔”，“丁卯授冠带官曹济为锦衣卫副千户，济，端嫔父也。”其次，端妃事发，家人亦被株连，男丁中最亲者十人均被诛杀。《世宗实录》载曰：“端妃曹氏时虽不与然，始亦有谋……诏不分首从悉磔之于市，仍镬尸梟示，并收斩族属十人，给付功臣家为奴二十人，财产籍入。”根据故宫中收藏的司礼监题本，当时宫中出诏曰：“这群逆婢，并曹氏、王氏合谋弑于卧所，凶恶悖乱，死有余辜。你们既打听明白，不分首从，都依律凌迟处死。各该族属，不分籍之同异，逐一查出，着锦衣卫拿送法司，依律处决，财产抄没入官。陈芙蓉虽系逆婢，阻拦免究。钦此钦遵。”依大明律，谋反者祖父、父子、孙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及同居之人，年十六以上，不论疾病残废，皆斩。曹济自然也不能幸免，更不可能再为爱女修坊了。另据《世宗实录》记载，曹察直到嘉靖二十二年仍在户部山西司郎中的任上。由此可见，曹察既不可能与曹济是同一人，也不可能是端妃一族近亲，否则早已被株连，断然不可能再任官职，曹端妃家族与曹察其实并无关系。

有人或许要问，虽然曹端妃与曹察无关，那么她和曹济是否是无锡人氏，死后有没有可能归葬无锡呢？答案仍是否定的。

对于二人的籍贯，正史中并没有记载。但有学者在考证河北固安一带流传甚广的“骑龙抱凤端妃娘娘”的民间传说时，根据当地相关史料指出曹端妃乃是固安县西辛里曹济之女。实际上，虽然明代前期确有不少后妃来自江南，但自中叶以后，绝大多数的后宫都是来源于选自京师附近的秀女。赵翼《廿二史札记·附补遗》卷三十二就写道：“明代选秀女之制亦非通行天下，大概多在京师附近之处，初两京并重，固后妃尚有南人……盖有明中叶以后，选妃多在京师，不及远方，恐滋扰也。”选秀女是明代后宫一大特色，据统计，明代45位成为皇后的妃子中，仅3人出身显贵，其余全来自秀女群体。嘉靖帝本人更是偏爱燕赵秀女，有一次命选女八岁至十四岁者三百人入宫，俱是京师内外民间良家。查继佐《罪惟录·帝纪》之十二也记载：“嘉靖十三年，诏选淑女作九嫔，礼部请求之外省，帝曰‘毋远求扰民。’”固安县紧贴大兴，自古称“天子脚下”，正在京师范围。“骑龙

¹作者单位：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检察院

抱凤端妃娘娘”的传说本身讲的就是嘉靖遣人来固安选秀女的故事。因此,认为曹端妃是固安人,较为可信,可备一说。如果有机会看到《固安县志》等史料,应该能找到相关线索。

同时,曹端妃墓也并不在无锡,而是在北京西山的金山口一带。据明末文人孙承泽所著的《天府广记》记载:“崇祯戊寅年九月间,(宗伯)策杖寻大师墓于金山口,远近十数里未得其处。乃于黑龙潭前平原广亩之间,禾黍既登,秋风落寞,出一石碣,云大内迁出二棺之记,旁书宛平县令名。”孙承泽,字退谷,是明末著名的收藏家,其书中所记的“宗伯”指的是清顺治年间的礼部尚书、宛平当地人王崇简。这段记载讲的是崇祯十一年,王崇简为寻找传说中的天下大法师墓,偶然在金山口发现了宫中迁出二具棺木的碑记。孙承泽在书中考证了大内迁出二棺的身份,认为:“宗伯所记,则此二棺世庙时有宫婢之变,波及曹王二妃赐死,宛平县收埋于此,要与建文无关也。”明确指出,此地所葬者就是曹端妃和王宁嫔。孙、王二人都是万历年生人,崇祯年进士,著述甚丰,其生活的年代距离壬寅宫变也不是太遥远,二人地位不低,文名不小,考略所记,应当不虚。

有人对此仍有怀疑,指出历代嫔妃普遍葬于皇室墓园,为何二妃会被乱葬?同时,二妃被弃市,为何尸身从大内迁出?笔者在此且不说二妃是有罪之身的问题。其实,北京西山一带本来就是明代皇家墓葬的集中地,连景泰帝也葬在这里。建国后,西山脚下,自海淀青龙桥一带向西南延伸到石景山一带,考古发现了大量的明代皇家墓葬。这也是民间为什么要把建文墓虚指于此的原因。二妃埋在西山,毫无问题。实际上,嘉靖善终嫔妃有约六十人,除四人葬在昌平袄儿峪,其余都葬西山。当时,刑部、锦衣卫等部门对上文所提诛杀逆婢的圣旨曾作过一个回奏,也被故宫收录。大致是说左都督掌锦衣卫事陈寅等官已将杨金英等十六人绑缚市曹处死,正在追杀其家人,谋杀皇帝用的绳子也封收官库等等,非常详尽,唯独没有提到曹、王二妃。据明史专家分析,二人作为嫔妃,断不可能送到街市暴露凌迟,应是在紫禁城内被秘密处死。从而解释了二棺为何是从大内迁出的问题。

至于那墓盖是否是曹察妻华氏的,目前无更直接的证据能确认。据《虞门曹氏宗谱》第二十六卷记载:“二十一世察,符公三子,号晴峰。嘉靖戊子举人,己丑进士,任福建邵武县令,晋内升户部主事,历员外、郎中,升福建汀洲知府,邵府、汀洲并祀,名宦有传。配华氏,乐静公女,赠安人,葬富安区青山湾垂字号。”从这段记载来看,察妻的确姓华,葬于富安乡青山湾(今太湖沿岸的十八湾一带)。根据历代无锡县志记载,姚湾一带一直属于富安乡范围,墓盖出土地段确实可能会有曹氏族墓。而根据存裕堂《无锡华氏通四三省公支宗谱》,华氏父亲乃荡口人华慈,其堂兄乃嘉靖年间进士华舜钦。华舜钦曾撰《明故户部郎中晴峰公行状》,对曹察一生有着比较详尽的记载,称“葬公于黄塘新阡合吾妹华安人。”意思是说曹察死后与华氏合葬。因此,我们并不排除曹察与华氏合葬于墓坊附近的可能。

但曹察妻子的诰赠是“安人”,而此盖则刻“孺人”,目前只能存疑。《明史·志第四十八·职官一》中将官员妻子之号分为六等,一品、二品曰夫人,三品曰淑人,四品曰恭人,五品曰宜人,六品曰安人,七品及以下则曰孺人。又《明会典》载,针对妻子,存者诰封,死者诰赠。根据曹察行状,其在嘉靖二十四年以户部主事(正六品)的身份落职还乡。据《世宗实录》记载,该年正是京察之年,曹察很可能是在这次考察中被降职免官的。只是,家谱中并未对华氏歿期予以记载。因此,察妻是依丈夫终官以“安人”诰赠落葬,还是逝于曹察县令任内,刻“孺人”墓志,日后追加“安人”,我们就不得而知了,需要有新的线索加以确定。

看来,姚湾无字牌坊的归属与谜题,仍有待后人继续地发掘与考证。不过依笔者推断,如牌坊与墓石所记的华氏孺人有关的话,坊制明显超越了墓主品级。目前在江南一带发现的明代墓坊往往以冲天式单间双柱为主,如在宁波发现的明吏部尚书屠滂父墓坊便是如此。明代礼制,“曾祖、祖、父皆如其子孙官”,堂堂正二品尚书的父亲也就享受这样的待遇,这样一座高规格的孺人墓坊,在封建礼制森严的当时恐有僭越之嫌。迫于社会压力,营造者最终不敢为华氏铭刻牌文,也就不难理解了。

湖风轻盈,绿浪婆娑,站在牌坊之下,眺望逝去的光阴,不由不令人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信言不美,真水无香,尽管历史的吉光片羽令无锡无字牌坊与一段惊心动魄的宫闱往事擦肩而过,但它的建筑艺术地位与文化旅游价值依然是不容置喙的。于后人而言,除了需要感谢文保工作者们的发掘和保护,最重要的是,无字牌坊历经数百年的风雨,始终矗立在无锡的

山水一角，静待着我们去寻访，探幽……